

俄罗斯与美国的中东外交

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新论^{*}

孙 超

摘 要: 本文以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的演进为研究对象,探究大国与小国交往关系的新模式。自冷战以来,基于在地区和全球环境中强烈的不安全感,两国形成一致性联盟,这种联盟关系不同于现实主义观念所演绎的大国—小国关系模式。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联盟的存在,历经苏联解体、政权变迁以及国家危机的两国盟友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随着西方威胁的增加而更为紧密。然而,这种关系模式的驱动力也较为脆弱,共同存在的不安全感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任何一方对周边环境和全球环境安全感的上升都会削弱这种一致性,从而影响两国联盟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 俄罗斯;苏联;叙利亚;联盟;新型联盟关系

作者简介: 孙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1-0016-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地缘政治利益始终是苏联(俄罗斯)制定中东政策的主要依据。从沙俄帝国到苏联,再到俄罗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都是获得更加安全且有助于军力投射的地缘空间。对苏联而言,中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地区不仅与苏联南部接壤,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投射的重要地域,而且也是维护苏联政治和军事安全、争夺冷战主动权、维护和扩展在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空间。^② 中东是苏联维护自身安全并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外缘地区,其战略

^{*}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与案例研究”(16JJDGJW01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②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2页。

价值与东欧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获取和巩固安全对苏联而言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有助于阻止其他外部势力控制中东,另一方面则为苏联与中东各国交往创造良好的地区环境。^① 苏联需要通过在中东各国的深度合作,来填补二战后英法撤离中东后留下的地区权力真空。

叙利亚被强邻环伺,独立后又历经长期的政治动荡,国家不安全感一直根植于该国的政治实践中。第一次中东战争和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形成加剧了中东安全环境的恶化。实现国家内部体制安全和外部环境稳定成为叙利亚当时最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恰与苏联通过结盟破除不安全感的心态不谋而合。20世纪50年代后,叙利亚与苏联在各领域的合作步入快车道。1980年,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苏叙友好合作条约》,加强了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与此同时,叙利亚与苏(俄)关系不仅受到两国政治变迁的影响,而且受到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第三方势力的冲击。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叙苏关系曾一度疏远。苏联解体后,叙利亚不再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反而成为俄外交事务上的“麻烦”。^② 叙利亚利用俄罗斯政权内部的分歧实行对冲策略,牵动俄罗斯势力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但随着俄罗斯内部分歧迅速被化解,叙俄关系进入新阶段,然而双边关系仍受到多方面限制。普京执政后,叙利亚再次成为俄维护国家外围空间安全的重要角色,成为俄罗斯与美国较量的最后防线之一。普京在叙利亚危机和反恐战争中的积极表现不仅巩固了俄罗斯在中东的据点,而且抵制住了阿拉伯“民主化浪潮”、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扩张和西方国家的强力干预,维护了阿萨德政权的安全。

叙利亚与苏(俄)双边关系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不对称联盟关系模式。两国既不属于大国控制小国的“庇护关系”模式,也不属于小国利用大国之间博弈而获利的“坐庄”模式。在现实主义看来,小国的独立总是依靠权力均衡,联盟的价值在于维持均势,并以此生存。联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实现“制衡”,即均势(balance of power)、制衡威胁(balance of threat)以及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③ 这些观点有其理论价值,但缺陷在于只解释了联盟的起源和生成,却无法解释联盟的存续,特别是当小国尝试跟随其他大国时联盟依然持续的问题。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制衡外部威胁。两国所形成的不对称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瓦解,反而在不同时段一直比较稳固,这就弱化了现实主义

^①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1.

^②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 18.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Humanities, 1979, pp. 120-128; Stephen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1985, pp. 9-10;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 No. 4, 1997, p. 928.

框架中联盟作为均势的功能价值。^① 使用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威胁弱化的前提下,两国关系依旧保持稳定的联盟关系,更无法解释在中东均势被西方破坏的前提下,俄叙联盟关系为何呈现出走弱的倾向。^② 反观联盟文化,即共同的不安全感和对威胁认知的一致看法,则成为两国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时紧密合作、患难与共的前提。这种大国—小国互动模式成为一种相互支持的不对称联盟关系的典型。本文尝试以苏(俄)与叙利亚关系史为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二、冷战时期叙利亚与苏联不对称联盟的形成

(一) 寻求庇护与支持

由于体量较小、资源较少,小国独立伊始若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寻求大国的支持。二战后,叙利亚为结束法国在叙的殖民统治,积极寻求诸大国的帮助,而苏联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与阿拉伯国家一直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早在 1943 年苏联就与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受此鼓舞,叙利亚积极与苏联外交代表开展谈判,以期获得苏联的承认。1944 年,苏联外交代表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借道巴勒斯坦秘密访问叙利亚和黎巴嫩,向叙利亚政府传达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地位和建立双边关系的意愿。很快,叙利亚就获得了苏联的承认。随后,苏联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送电报,强调两国关系平等,废除沙俄帝国的各种条约和特权,并表示苏联支持、增强和巩固叙利亚的主权和独立。^③ 对苏联如此热情积极的态度,叙利亚政府感到非常满意。大国向小国示好一方面意味着两国合作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大国争斗的开始。苏联和英国、美国是叙利亚政府对抗前宗主国法国干预的重要砝码,各国对叙利亚主权的承认旨在防止法国将叙再次殖民化。在 1945 年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列入议事日程,并同美国一道要求英法军队从叙利亚撤出。1946 年,苏联分别与叙利亚、黎巴嫩签订秘密条约,在支持两国完全独立和提升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同意向两国政府派遣军事人员,帮助两国组建国民军队。^④ 苏联积极支持叙利亚独立之初的革命政权,为两国日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既拓展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也顺应了叙利亚寻求安全的心理。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0-215 页。

^② 关于中东联盟关系的详细阐释,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Rami Ginat, "Syria's and Lebanon's Meandering Road to Independence: The Soviet Involvement and the Anglo-French Rivalry,"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3, No. 4, 2002, p. 106.

^④ Rami Ginat, *The Soviet Union and Egypt, 1945-1955*, London and Portland: Frank Cass, 1993, pp. 69-70.

1946年,叙利亚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独立后的传统民族主义者继续扮演着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以库阿特里为代表的民族同盟(民族爱国同盟)成为独立初期叙利亚的执政党。^①1947年,民族同盟因部族和家族利益分裂为国民党和人民党,阿拉伯社会党与阿拉伯复兴党也于此时崛起。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叙利亚内部势力纷争不断,苏联与叙利亚的关系并未得到显著提升,但苏联还是恪守了秘密条约的义务。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②苏联与叙利亚官方的文化互动日益积极和频繁,如苏联曾向叙利亚派遣文化代表团进行过长达数周的友好访问。

(二) 小国政治的喜剧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严重干预叙利亚内政,对叙利亚的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激起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因此,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反美思潮逐渐成为叙利亚外交的主旋律。大国尝试主导叙利亚政局并发挥影响力的“庇护关系”模式从一开始就被叙利亚否定。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从崛起国转变为霸权国,能够为叙利亚提供较为丰富的国际公共产品,但叙利亚社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观念一直对这种“庇护关系”持否定态度。事实上,英美等“帝国主义式”认知框架并未顾及到小国的利益,其目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并拓展在中东的影响力。^③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逻辑自然会引起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反抗。20世纪50年代初期,叙利亚开始积极向苏联靠拢,苏联出于冷战的需要向叙伸出援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叙利亚与苏联在1950年签订过秘密经济与军事协议,并通过拉塔基亚港口获得了大量苏式装备。^④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由此不仅获得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信任,而且将势力迅速渗透到中东地区。

西方国家并不愿意看到苏联扩大在中东的势力范围。1950年5月,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发表“三方声明”,承认中东国家有权购买武器装备用于国家防卫,但军备只能售给那些放弃侵略的国家。^⑤阿拉伯国家随后接受了这份三方声明,并希望借助西方国家力量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复兴。由于西方国家的利益诱惑,叙利亚并没有与苏联走得更近。这正体现了“小国政治的喜剧”,巨大的利益诱惑可以消解小国原先赖以依托的政治信任,通过制衡大国的权力博弈而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政局不稳定的小国而言,其利益诉求比其他诉求更为明显,其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更

①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3页。

② Rami Ginat, "Syria's and Lebanon's Meandering Road to Independence: The Soviet Involvement and the Anglo-French Rivalry," p. 115.

③ Ibid., p. 96.

④ CIA Memorandums 1950-1952, box 250,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issouri. 转引自 Rami Ginat, "Syria's and Lebanon's Meandering Road to Independence: The Soviet Involvement and the Anglo-French Rivalry," p. 117.

⑤ "Tripartite Declaration Regarding Security in the Near East,"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I, June 5, 1950, p. 886.

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期之前,苏联只是愿意与叙利亚合作的大国中的一员。

如果仅从国际关系角度审视而不考虑政体或政治变革的因素,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将一直上演“小国坐庄”模式。美国和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虽然都发挥着影响,但影响都较为有限,埃及、叙利亚等国家能够顺利地从大国的争斗中获得自主性,并通过各国出让好处、提供安全保障等获得安全和援助。^①在两极格局的体系中,大国对小国的争夺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小国观看“大国游戏”,保持与各国关系的平衡,获取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

埃及正是如此。埃及纳赛尔政权并没有倒向任何一个阵营,反而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成功利用大国的矛盾将英法势力赶走,实现国家的自主性。在叙利亚,情况却有所不同。1954 年,叙利亚举行大选,新兴左翼政党及中间派人士在选举中所获席位数量增加,但 1958 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很快打断了叙利亚的政治演进,叙利亚民族主义者遭到排挤和打压,引起叙利亚国内普遍不满。1961 年,叙利亚资产阶级地方集团和右翼军官发动政变,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独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②

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叙利亚与大国的互动。随着传统势力的没落和左派力量的崛起,苏联在叙利亚的影响力逐渐增长,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到达顶点。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时,苏联希望派出志愿军帮助埃及收回运河主权,表示“给予叙利亚必要的支持以克服殖民主义后遗症”,并强调“并不需要回报”。^③苏联同情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对西方大国干预以及敌视以色列的政策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欢迎。^④苏联向叙利亚承诺,帮助叙防范土耳其对其内政的干预,支持叙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与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贸易协议,并给予三国大量的经济援助。^⑤1957 年 7 月,叙利亚与苏联政府签署第一个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并开展广泛的合作,援助总额达 5.79 亿美元。^⑥共产主义既成为两国精英的认同基础和对抗西方与以色列的观念来源,也成为苏联和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沟通工具。

(三) 盟友关系的确立

叙利亚与埃及合并后遇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强推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最终酿成军事政变。随后叙利亚再次进入动荡期,接连发生多次军事政变。1963 年

^① 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12 期,第 27 页。

^②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 224 页。

^③ Philip K. Hitti, *Syri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9, p. 256.

^④ *Ibid.*, p. 256.

^⑤ John R. Swans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ab World: Revolutionary Progress Through Dependence on Local Elite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74, Vol. 27, No. 4, p. 645.

^⑥ W. Z. Laqueu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59, pp. 247–264.

“三·八革命”成功后,以复兴党军事委员会为代表的新生代在政治角逐中崛起,确立了党政合一的军政体制。1966年2月,叙利亚复兴党少壮派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等人再次发动政变,夺取了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的领导权。^①至此,叙利亚政局随着复兴社会党的崛起逐渐趋于稳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叙利亚对外关系需要再次构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秉持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将社会主义作为阿拉伯理想的生活方式,并推崇一党统治。^②1970年,阿萨德发动不流血的政变推翻原政府,确立了以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新兴政权的巩固不仅需要内部的统一,更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1966年,叙利亚再次与苏联结好,签订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勘探与开发、大型水利工程等项目,但之后爆发的“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改变了叙利亚周边的安全态势。

第三次中东战争历时仅六天,却给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造成重大损失,叙利亚在战争中丧失了戈兰高地。美苏两国在此次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给阿拉伯国家留下了不同印象。美国被阿拉伯人视为敌对势力,它既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又是承继英法权力的新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以色列对抗阿拉伯各国的幕后帮凶。^③尽管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袖手旁观,但仍被赋予了更多的道义光环,被视为不干涉阿拉伯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亲善国家。^④在美苏两国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实现战争停火后,苏联开始了密集的外交行动:重新武装埃及,派遣军事顾问;与以色列断交,在安理会举行谴责以色列的会议;在战争后向埃及、叙利亚两国分别提供了17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⑤这些行动取得了切实成效。为改变与以色列“不战不和”的状态,1971年埃及与苏联签订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而叙利亚则与苏联签订了军事防御协定,并向苏联提供港口。阿拉伯国家在获得苏联支持后,于1973年10月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没有改变中东地区的强弱格局,叙埃再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在反对阿拉伯人向以色列进攻的同时,也认识到经营叙利亚的重要性,便持续向叙利亚空运了大量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不仅弥补了叙利亚的战争损失,还使叙军力大大超过战前。^⑥1971年至1978年,为稳固叙苏关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先后七次访问苏联,成为苏联的“铁杆”盟友。

一直以来,叙利亚处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以色列对抗的前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争不仅意味着国家间的冲突,更体现了大国的角力和中东地区的权力结构。叙以冲突可以影响到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权力格局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第三

① 王新刚、于晓冬:《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和现实困境》,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68页。

② 彭树智主编:《20世纪中东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③ Saad E. M. Ibrahim, "Arab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and after June War of 1967,"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6, No. 2, 1972, pp. 237-238.

④ Ibid.

⑤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284页。

⑥ 刘竞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06页。

次中东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将美苏两国固定在了对抗的两极,并不利于美苏缓和政策的实施。因此,美苏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安理会决议处理战后问题。埃、叙同以色列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中东的权力平衡和稳定,同时对地区安全与和平带来了较大威胁。这些因素使得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东稳定的重要力量。叙利亚也认识到了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它不仅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键角色,更因处在中东冲突的漩涡之中,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为了维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庇护关系”的平衡,叙利亚有必要寻找更适合其自身的联盟关系。除埃及之外,苏联是叙利亚最好的选择。1972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并邀请叙利亚一同建立开罗(埃及)—大马士革(叙利亚)—利雅得(沙特)反以、反苏轴心。^① 叙利亚对此并不感兴趣,反而与苏联关系更加友善。苏联对叙利亚的军事援助随即迅猛增长。自1972年起,苏联与叙利亚先后签订了三项军事协定。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叙政府军已装备苏式 T-54/55 和 T-62 型坦克 750 多辆,100 多门火炮,覆盖以色列全境的 FROG-7 蛙式地对地导弹;叙利亚空军则装备苏联米格-21 战斗机 100 多架,大量运输直升机,SA-3 和 SA-6 防空导弹。^② 此外,苏联还向叙利亚派遣大量军事顾问,派驻的军事专家多达 3,500 人。随着 1979 年埃及与以色列和约的签订,阿萨德进一步认识到没有苏联的支持,叙利亚的弱小国力将难以应对中东地区不断变化的局势。

叙利亚需要与苏联建立长期稳定的盟友关系,以抵御外来风险。而叙利亚又是苏联进入中东地区、获得对美战略优势的最好突破口。1980年10月8日,叙利亚与苏联缔结了为期 20 年的《叙苏友好合作条约》,明确了双方军事合作的立场,同时强调“坚决回击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推行的侵略政策;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主张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③。1980年叙苏联盟关系的确立能够平衡全球层次的美国、地区层次的以色列的权力优势。正是利益和外部威胁的一致性,叙苏两国总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建设多层次关系,并不因政局动荡和时代变迁而破坏关系模式。^④ 叙苏联盟关系的正式确立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新高峰,联盟关系得到切实巩固。

三、苏(俄)叙联盟关系面临的考验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强烈不满。1980年,伊拉克与伊朗爆发两伊战争,叙利亚因公开支持伊朗导致自身陷入以色列和伊拉克的夹击之下。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企图消灭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

① 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96页。

②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p. 37.

③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295页。

④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19页。

导弹基地,叙以在黎巴嫩交战,叙利亚处境更加艰难。由于两伊战争中伊朗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处于孤立境地,叙在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发动战争时只有伊朗提供了军力支持。^①阿富汗战争、黎巴嫩内战和两伊战争的爆发成为大欧亚地区特别是中东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事件。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苏联与叙利亚在互惠基础上的盟友关系经历了严峻考验。

第一,苏联对外战略的调整冲击着苏叙盟友关系。阿富汗战争使苏联在中东的声望急剧下降,苏联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共同敌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已不再拥有昔日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60年代中后期,勃列日涅夫推行扩张战略,对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国家进行了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使其在战略上日益孤立。^②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开始寻求同美国和西方缓和关系,甚至不惜牺牲苏联在中东盟国的利益。^③苏联极力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允许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大规模移民引起了大马士革的不满。苏联向以色列的移民无疑提升了以色列的经济和军力水平,同时也改变了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权力平衡。^④在叙利亚看来,苏联的行为无疑是帮助西方对付阿拉伯国家。

第二,苏联难以满足叙利亚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需求。30年的苏叙关系已发展成为多管道、系统性的关系网络。叙利亚成为苏联势力在中东存在的重要标志,但也需要苏联投入大量资源来维系。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加紧武装叙利亚,使叙武装力量增强,在中东地区变得越来越强硬。^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1985年、1987年和1990年先后三次出访苏联,要求苏联援助叙利亚抵抗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并支持叙利亚同以色列进行对抗。但实力急速下降的苏联难以满足叙利亚的要求。当时的苏联经济困难日益严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农业连续四年欠收,社会弊端丛生。^⑥在全球战略受阻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尽管苏联尽力维持苏叙联盟的稳定,但支持力度大不如前。^⑦1984年,叙利亚14,000名左右来自苏联东欧地区的军事专家中,至少有一半来自苏联。^⑧但从1985年开始,苏联驻叙利亚的军事专家数量大幅度下降,维持在4,000人左右。^⑨另外,苏联对叙利亚的军售不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而是为了维持苏联在中东的地位,进而使对叙军售逐渐蜕变成苏联严重

① 何志龙、张尼:《叙利亚与两伊战争》,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第78页。

②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2页。

③ 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第102页。

④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pp. 17-18.

⑤ 宋锦海:《勃列日涅夫以后苏联的中东政策》,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2期,第50-51页。

⑥ 贾山:《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苏联对中东的政策》,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5期,第80页。

⑦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p. 12.

⑧ Ibid., p. 36.

⑨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0, pp. 205-206.

的财政负担。^①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使叙利亚购买苏式武器装备和资金捉襟见肘,进一步影响了苏联介入中东事务的热情。^② 苏联对中东内部冲突从积极介入到“审慎地加以忽略”,再到呼吁根据“六项原则”^③处理中东内部问题,反映了苏联中东政策欲罢不能的“两难心态”:既要维持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又无力适应中东高烈度的美苏竞争,难以有力掌控变化的中东局势。^④

第三,叙利亚外交议程设置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增强压缩了苏联对叙利亚施加影响的空间。20 世纪 80 年代初,阿萨德政府面临国内经济危机。由于发展战略不合理、宏观经济结构失调、油价下跌、外汇短缺,叙利亚经济出现问题,1981 年到 1989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20%。^⑤ 当时的叙利亚处在内部危机加剧和外部援助减少的双重困境中,政权危机进一步引发外部孤立。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支持伊朗的行为令其在阿拉伯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1986 年,鉴于国内压力,在与伊朗保持战略盟友关系的同时,叙利亚决定冰释与伊拉克的关系,选择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⑥ 随后,叙利亚又成功支持黎巴嫩废除黎以协议,促使黎巴嫩内部各派势力实现和解,叙利亚遂成为黎巴嫩和解后的最大受益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地区变局中,叙利亚政权的内部危机在没有得到苏联支持下就得以缓解,苏叙的同盟关系经受着多方面的挑战。

阿萨德政权认识到,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谋求缓和,对盟友的政治承诺难以维系。苏联晚期的国家危机也使其难以承担盟友的责任。基于此,叙利亚开始改善与埃及的关系,承认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袖地位。在随后爆发的海湾战争中,叙利亚积极配合美军的行动,满足了美国对叙利亚的期望。美国调整了对叙利亚的制裁政策,两国关系开始走向缓和。1990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叙利亚并会见阿萨德,这是美国高官时隔多年后第一次访问叙利亚。11 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叙利亚,就中东和平进程等多项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冷战末期,美国国会与行政机构对叙利亚态度的分歧影响了美国—叙利亚—以色列三边关系以及

① G. Ofer, “The Economic Burden of Soviet 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Soviet Studies*, Vol. 24, No. 3, 1973, pp. 329–347.

②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p. 47.

③ 1982 年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宴请南也门总统时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六项原则”,表达了苏联的基本立场:不允许通过侵略来占领他国土地,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一切领土应归还阿拉伯人;切实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在以色列将撤出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有建立国家的权利;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的东部应归还阿拉伯人并成为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生存和发展;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结束交战状态并确立和平;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安理会担负起研究并时时国际调解保证。参见刘靖华:《八十年代苏联中东政策的发展演变》,载《西亚非洲》1988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④ 刘靖华:《八十年代苏联中东政策的发展演变》,第 6 页。

⑤ 王希:《阿萨德政治体制简析》,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3 期,第 59 页。

⑥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 308–309 页。

中东和平进程。^① 尽管叙利亚在海湾战争期间向美国传递过改善关系的信号,并支持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但由于国会的阻挠和犹太院外集团的强烈抗议,行政部门并未把握住改善与叙利亚关系的良机,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叙利亚自身也面临转型压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叙利亚亟需在内政外交上进行调整。因此,阿萨德政府开始进行改革,在经济和外交上进行大幅调整,开始了两场较具规模的转型。第一场是经济转型,在 80 年代中后期,叙利亚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更为自由开放的外向型经济。90 年代叙利亚经济出现较大起色,日均最高产油量达 60 万桶,农业发展迅速,小麦、棉花和柑橘实现丰收,实现了 7% 的 GDP 增长率。^② 第二场是对外关系转型,重点是调整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关系。首先,两极格局的终结将苏联从对叙利亚供应大量武器的支持者中排除,削弱了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军事制衡。^③ 叙利亚认识到已难以继续从与以色列持续敌对中获益。尽管叙利亚并没有改变维护阿拉伯人权利以及维护自身地区利益的原则,但叙利亚还是参与了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在中东和平会议做出了程序上的让步。^④ 1991 年 10 月,中东和平会议在马德里顺利召开,叙利亚与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和以色列在美国的倡议下走到谈判桌前,寻求政治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其次,叙利亚的对外关系转型顺应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在叙利亚看来,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并非是阿拉伯国家的“灾难”。^⑤ 尽管两国寻求安全的一致性减弱,但叙利亚基于传统关系仍继续维持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1991 年,叙利亚承认俄罗斯联邦为苏联合法继承国家。1992 年,叙利亚外交部长访问俄罗斯,希望俄罗斯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叙利亚逐渐走近美国,并在海湾战争和随后的中东和平谈判中表现出色。叙利亚顺利适应了单极世界的游戏规则,在对美交往中显示出灵活性和实用性等特点,赢得了美国行政部门的赞誉和支持。随后,美国多次召集叙利亚和以色列举行圆桌会议,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讨论多项议题,进一步改善了叙以关系,提升了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⑥ 叙利亚利用国际时局的改变掌握主动权,扭转了冷战时期的孤立态势,成为当时地区变局的赢家。

^① Robert Rabil, "The Ineffective Role of the US in the US-Israeli-Syrian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5, No. 3, 2001, pp. 415-438.

^② William E. Schmidt, "The Fertile Crescent Blooms Anew,"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94.

^③ [英]巴黎·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8 页。

^④ Hisham Melhem, "Syria Between Two Transitions," *Middle East Report*, No. 203, 1997, p. 4.

^⑤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p. 18.

^⑥ Ahmad SoltaniNejad, "The Ineffectiv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yrian-Israeli Peace Process During the 1990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13, No.1, 2006, p. 48.

四、后冷战时代俄叙联盟关系的巩固

俄叙联盟关系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亡。尽管两国关系历经国际体系变革和权力更替的考验,但俄罗斯和叙利亚基于共同的不安全感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双边关系。双方共同应对外部挑战,使同盟关系得到了延续和巩固。

(一) 俄叙同盟关系延续的困境

海湾战争后,美国主导了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和巴以和平进程。与此同时,俄罗斯确立了新的国家边界和国家利益。^① 俄罗斯不再与中东国家直接接壤,中东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俄罗斯军事投射能力也大幅减弱。^② 在此前提下,俄罗斯开始优先考虑中亚、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和国家。^③ 俄罗斯虽然承继苏联时代的传统关系,与叙利亚关系进行重新对接,但对接过程并不容易。1992 年 10 月,俄罗斯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组团访问叙利亚,与叙总统阿萨德举行会谈。叙利亚拒绝向俄罗斯偿还 110 亿美元债务,并要求俄罗斯持续提供军备支持,^④而俄罗斯将叙利亚偿还债务视为提供军备的前提条件。叙利亚与俄罗斯关系一度降到两国关系的最低水平。

即便如此,两国还是继续保持交往。1993 年,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访问叙利亚,并向叙利亚表示俄愿意参与巴以和平进程。与此同时,阿萨德政府密切关注着俄罗斯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与俄总统叶利钦及其竞争对手保持联系管道畅通,但叙利亚已不再是俄罗斯域外的首要盟友。^⑤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俄罗斯民族主义崛起,叶利钦敏锐地意识到国内 2,000 万穆斯林与中东问题密切相关,叙利亚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重新上升。与此同时,美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政权更替的做法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不满,叙利亚与俄罗斯具有体制上的相似性,也面临着美国“人道主义”干预的危机。^⑥ 1997 年,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访问叙利亚,恢复了与叙利亚的战略合作关系。2000 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从黎巴嫩撤军,俄罗斯注意到了叙利亚什叶派(阿拉维派)对于制衡美国中东霸权的重要性。^⑦ “9·11”事件后,美国霸权的强势以及北约和欧盟的双重东扩促使俄罗斯需要进一步开展对叙外

①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6 页。

② 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第 102 页。

③ Alain Gresh, “Report From Moscow: Russia’s Return to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8, No. 1, 1998, p. 67.

④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p. 18.

⑤ Ibid., p. 19.

⑥ Samuel Charap, “Russia, Syria and the Doctrine of Intervention,”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5, No. 1, 2013, pp. 35–36.

⑦ 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第 106 页。

交,以平衡美国霸权并降低俄同西方竞争中的不安全感。

(二) 不安全感与盟友关系的增强

政权安全问题是叙利亚面临的一大难题。从内部看,以领袖魅力型权力维系政权的军政府模式面临着体制更新的难题。自哈菲兹·阿萨德在叙利亚建立领袖魅力型统治以来,国家、政党和军队与个人权威整合在一起,构成叙利亚政权的统治架构。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子承父业继任总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由复兴党领导完成政治有限民主化和多元化。^①但“子承父业”的继承方式并未得到普遍支持,而政治改革也没有满足叙利亚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而阿萨德家族的腐败行为进一步导致阿萨德政权合法性的下降。2003年,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力量“叙利亚改革党”在美国组建,其宗旨就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建立民主国家。^②叙利亚经济也逐渐陷入困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官僚主义和贪腐盛行。叙利亚全国失业率超过20%以上,30%的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49美元)以下,大多数年轻人面临失业而不得不到黎巴嫩等其他阿拉伯国家打工。^③

从外部看,黎巴嫩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以及美国霸权都对叙利亚政权稳定构成威胁。20世纪90年代末,与叙利亚存在特殊关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势力崛起,强烈主张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黎巴嫩民族主义领袖、前总理哈里里促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559号决议的通过,敦促叙利亚撤军。^④叙黎特殊关系的改变不仅影响着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增强了叙利亚的不安全感。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将中东再次拉回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在此背景下,叙利亚政权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内部极端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二是西方国家敌视叙利亚政权,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美国的全球反恐斗争打响后,“基地”组织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并加大了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态势。除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和库尔德反叛组织外,“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叙利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并渐成气候,对叙利亚政权构成重大威胁。^⑤而美国则以叙利亚政权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采取多种措施在中东开展政权更迭的强制民主化实践,严重威胁着叙利亚的政权安全。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巴沙尔政权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

① 王新刚、于晓冬:《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历史和现实困境》,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70页。

② 陈双庆:《叙利亚动荡政局及其走势》,载《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6期,第32-33页。

③ 同上。

④ 柳莉:《叙利亚:美国的下一个目标?》,载《当代世界》2005年第12期,第16页。

⑤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0-125页。

俄罗斯与叙利亚都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实力大为衰落的俄罗斯意识到,放弃与叙利亚已有的盟友关系将使其在未来付出更大代价。叙利亚也深深地意识到,俄罗斯的支持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共同的安全利益驱使两国再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99 年哈菲兹·阿萨德访问莫斯科,被认为是“叙俄关系的转折点,反映了两国长存友谊关系的精神表现”^①。在会谈中,阿萨德和叶利钦都主张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世界多极化,呼吁增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随后俄叙发布公报,两国元首承认了俄罗斯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俄罗斯也认可叙利亚在黎巴嫩的特殊地位,支持叙黎团结。^②

2000 年前后,俄罗斯与叙利亚国内政局都发生了变化。普京取代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去世。普京上台后表示,俄罗斯继续维持与叙利亚的联盟关系,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普京高调支持叙利亚威权政体并发出警告说,“即使有不喜欢的政权,也不应该从外部对其加以改变”,^③俄叙两国关系再次升温。2005 年,阿萨德访问俄罗斯请求给予支持,并支持俄罗斯在中东发挥作用。此后,俄罗斯决心恢复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巩固与叙利亚的盟友关系。普京宣布免除叙利亚在冷战时期欠苏联的 98 亿美元债务,占俄总债务的 73%;^④在剩下的 36.15 亿美元债务中,其中 15 亿美元叙利亚需要在十年内偿清,另外 21.18 亿美元允许使用叙利亚里拉交付,这笔钱将用于叙利亚的投资建设。^⑤在贸易层面,俄叙双边贸易额在 2004 年仅为 2.18 亿美元,2005 年后迅速增长,到 2008 年时接近 20 亿美元。^⑥在外交层面,俄罗斯外交代表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多次否决不利于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并最终通过了第 1636 号决议,避免了叙利亚被制裁的风险。俄罗斯在国际场合既维护叙利亚的利益,反对针对叙利亚的各种制裁,又采用擦边球的手法避免与美欧直接对抗。正如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威胁的语言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如果对叙利亚事务关切的话,应掌握充分的证据并通过对话来解决”^⑦。这种方式契合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也减轻了叙利亚所遭受到的国际压力。在军事层面,2010 年前俄罗斯在叙利亚只有技术支援站,该站拥有三

① Andrej Kreutz,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iend or Foe?*, p. 25.

② 《俄罗斯与叙利亚一致同意提升关系》,新华社,1999 年 7 月 6 日电。

③ Roy Allison, “Russia and Syria: Explaining Alignment with A Regime in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4, 2013, pp. 804–807.

④ “Russia Writes off \$ 9.8 Billion of Syrian Debt,” *Daily Star*, January 2, 2005,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2005/Jan-26/71201-russia-writes-off-98-billion-of-syrian-debt.ashx>, 登录时间:2016 年 7 月 7 日。

⑤ Andrej Kreutz, “Syria: Russia’s Best Asset in the Middle East,” *Russie. Nei. Visions*, No. 55, November 2010, p. 9,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kreuzengrussiasyrianov2010.pdf>, 登录时间:2016 年 7 月 17 日。

⑥ “Finance Minister: Moscow to Write off 73 Percent of Syria’s Debt,” *Interfax*, January 25, 2005.

⑦ Robert G. Rabil, *Sy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p. 203–204.

个浮动的系泊处,一个浮动的工作站、一个军械库、一个兵营以及多种装备设施。^①自2010年以来,俄罗斯重建了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军港和梅赫米姆空军基地,随后又修建大型后勤基地,并锚泊大型航空母舰。^②此外,俄罗斯还不遗余力地阻止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民主化”改造,采取多种措施支持阿萨德政权的稳定。

(三) 中东变局以来俄叙联盟关系的巩固

2011年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抗议运动,并逐渐演变为叙利亚内战。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区国家动荡逐渐演变成大国的地区控制权之争。在国际层面,西方和地区国家提出的不利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提案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多次否决,西方国家妄图重塑叙利亚政权的图谋受挫。在地区层面,叙利亚危机成为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以沙特、卡塔尔为首)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博弈的重要平台,叙利亚成为这场纷争的受害者。叙利亚内部政治分裂严重,各方势力政治极化并最终升级为内战。各方在叙利亚都有代理人,而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地区极端势力在叙利亚疯狂肆虐。阿萨德政权因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冲击而摇摇欲坠,地区大国的博弈和恐怖主义的抬头,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的政权危机,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也面临着两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危机,它们严重冲击了俄罗斯的国力。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遭受了西方势力的排挤、孤立和经济制裁。即便如此,俄罗斯并未放弃叙利亚,相反却将叙利亚视为对抗西方的桥头堡。丢失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意味着在中东失去盟友,还面临着国际声望下降和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泛滥的风险。因此,俄罗斯加大了对叙利亚危机的介入力度,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攻势:一方面积极倡导召开国际会议,争取获得有关叙利亚问题外交议程的主动权;另一方面着手组建常驻地中海舰队,并对叙利亚增加S-300防空导弹系统、“红宝石”反舰导弹等军事援助,^③叙利亚因此同俄罗斯签订了40亿美元的军事订单。叙利亚危机以来,俄叙贸易迅速增长,仅在2011年两国贸易额就达到19.7亿美元。^④

2015年9月底,俄罗斯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反恐,采用空袭等手段展开了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2016年3月15日,普京宣布克里姆林宫已经实现在叙利亚的所有目标,俄军主要力量将从叙利亚撤出。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指出,自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冲突以来的5个半月,俄军出动战斗机9,000架次,成功夺回400多个居民点,消灭2,000多名恐怖分子,摧毁209个石油生

① 韩旭东:《美军撤出伊拉克:中东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载《亚非纵横》2010年第5期,第31页。

② 孙超:《空袭叙利亚:俄罗斯的外交巧棋》,观察者网,2016年4月25日, http://www.guancha.cn/sun-chao/2015_10_12_337141.shtml, 登录时间:2016年7月5日。

③ 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86页。

④ 孙超:《空袭叙利亚:俄罗斯的外交巧棋》。

产设施以及大量的石油运输储备,并彻底斩断了恐怖分子的补给线。^① 在普京宣布撤军的同一天,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刊文指出,“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区自 2015 年 12 月至今已经缩小了 22%。^② 普京在此刻高调宣布撤军显然达到了其所宣称的战术目标,并成功赢得了声望。

事实表明,俄叙盟友关系随着国际体系的转换和中东问题的复杂化而更加坚定,两国基于同样的不安全感关系得以存续,至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尽管叙利亚内部冲突仍处于胶着状态,但阿拉维派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的现实,使巴沙尔政权至今仍然保持对国家的全面控制。^③ 叙利亚再次将俄罗斯视为合作的首要盟友,延续了苏联时代的友好同盟关系,并逐渐形成了基于共同安全的同盟。俄罗斯尽管面临内外危机,但在关键时刻介入叙利亚内战,为延续阿萨德政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自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以来,阿萨德政权被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组织颠覆的概率大为下降。俄军牢牢占据着梅赫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并保留迅速介入的军事力量。叙利亚政权的生存得到了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和政治保证。

2016 年 2 月 26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268 号决议,要求叙利亚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阿萨德政府显然不愿意对反对派作出过多让步。政治解决能否实现取决于美俄两国能否达成实质性妥协。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叙利亚危机能否实现政治解决将受到美俄关系调整、乌克兰危机、欧盟对叙政策、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五、结语

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联盟关系的确立源于冷战时期双方消除不安全感的相互需要。这种从全球和地区政治出发而逐渐确定的关系,并不是现实主义思维所演绎的“庇护—代理”和“小国坐庄”的关系模式,而是基于双方对地区和全球政治环境和国内的不安全感所作出的一致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基于机会主义或是沙文主义的,而是基于一种对国家生存的理性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认同观,反映了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各自国家所处环境的一致性。^④

^① Nikolai Litovkin, "Syria Withdrawal: Which of Russia's Forces Are Being Pulled Out,"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March 15, 2016, https://rbth.com/international/2016/03/15/syria-withdrawal-which-of-russias-forces-are-being-pulled-out_575927, 登录时间:2016 年 7 月 10 日。

^② Columb Strack, "Islamic State Loses 22 Percent of Territory," *IHS Jane's 360*, March 16, 2016, <http://www.janes.com/article/58831/islamic-state-loses-22-per-cent-of-territory>, 登录时间:2016 年 7 月 11 日。

^③ 王建:《叙利亚危机为何难以平息》,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5 期,第 27 页。

^④ Roy Allison, "Russia and Syria: Explaining Alignment with A Regime in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818.

然而,这种关系并非恒久不变的友谊关系。通过对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关系史的分析可以发现,双方领袖并没有结成良好的私人友谊,两国存在显著的文明差异,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往来较少。俄叙两国之间的互动虽然频繁,但却局限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层面。俄叙相互之间依然是陌生的国家,一方的政权变革并没有引起另一方强烈的反应。在地区体系或是国际体系发生变革之时,双方的联盟关系会自动加强。联盟的驱动力既来自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中东利益考量,也来源于叙利亚与以色列同西方关系的变化。俄叙关系是以两国共同安全为核心形成的一种联盟结构,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这种奇怪且复杂的关系模型很难从现实主义权力界定利益的主张来进行分析,也难以适应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的分析框架,更不是从建构主义角度出发的安全文化。较为合理的解释路径是从关系的系统效应进行分析,即两国存在“一致性”的不安全感,联盟关系构建并不是源自客观存在外部威胁的冲击,而是双方共同拥有不安全感心理,以及保护共同安全空间的迫切性。

按照杰维斯的说法,维持一致性的最大力量在于拥有共同的敌人。^①对叙利亚而言,与阿拉伯民族复兴力量对抗的是敌人,而对其政权生存构成威胁的也是敌人;冷战时期的西方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消解其作为敌对方的身份。随着时代的演进,尽管俄叙两国的外部威胁力量发生变化,但外部威胁感的存在已经对关系文化形成惯性效应,西方成为两国共同的敌人或他者。他者力量的强大是俄叙国家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也是两国一致对外的重要内容。为了对抗强大的他者,弱者必须要联合在一起,保持一致性,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尽管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在国家规模和国家利益上都存在差异,但基于不安全感的一致性促使双方结成了联盟关系。这种一致性促使两国建立和维系联盟,并成为联盟关系稳固的核心。联盟关系的减弱即是一致性的减弱,而这种一致性减弱只有在国家安全感增强时才能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联盟关系不会因为外部威胁的下降而消失,一致性将顽固地维持联盟关系的存在。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和叶利钦执政初期,西方与苏联(俄罗斯)关系一度缓和,西方对苏联(俄罗斯)的威胁下降时,俄罗斯的安全感会增强,其与叙利亚的盟友关系自然会发生松动,但并没有放弃与叙利亚的联盟关系。俄罗斯(苏联)与叙利亚关系的演变表明,基于不安全感一致性的联盟关系可以成为解释大国—小国同盟关系模式的新范式。

(责任编辑:李 意)

^① 关于联盟的系统效应,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300页。